

解构“大屋顶”——《首都计划》中的传统再造与文化镜像

张富杨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首都计划》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城市规划文本，对南京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划功用价值与历史局限性，部分研究虽拓展至社会-历史背景考察，但仍有深化空间。本研究在民国社会转型的复杂历史语境下，以《首都计划》推崇的“大屋顶”式建筑为核心分析对象，探究这一文化表征如何贯通“首都”所代表的“文化精华之荟萃”，进而被赋予构建“文化自主”的功能。研究发现《首都计划》对“大屋顶”这一“传统”的再造过程中，城市建筑成为了文化观念传播的重要机构；而“大屋顶”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展现了在西方文化“镜像”下自我重塑的中国地方文化，揭示了当时社会变革中文化转型的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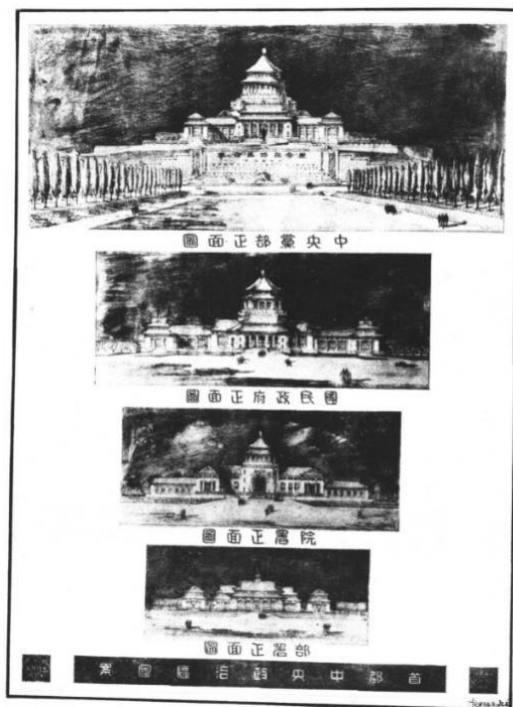
关键词：《首都计划》；固有式建筑；城市史；文化转型；镜像理论

DOI：10.64216/3080-1516.25.06.063

“良以首都之于国，固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观人国者，观其首都，即可以衡量其国民文化地位之高下”^[1]。为支撑新生政权，确立城市管理话语权，主导《首都计划》编制的孙科在序言中开宗明义，阐明新都建设中“文化”的重要性。《首都计划》的插图中，呈现出传统中国建筑一脉相承的“大屋顶”形象——这正是计划中所定义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而传统建筑意象与西方透视图技法的融合，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从百年后视觉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回望，我们很难精准界定它带给人们的感受在多大程度上契合本雅明笔下的“惊颤体验”^[2]，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感受已深度融入现代城市图景的建构过程中。

《首都计划》参照西方主流城市生活推崇的现代图景，勾勒出南京城市未来的样貌；同时深刻阐述了首都建设对确立国家“文化地位”的重要价值。这份计划曾赋予人们强烈的信念，即便其构想未能完全实现。伴随《首都计划》而生的民国“黄金十年”落幕之后，更引人注目

的是它从轰轰烈烈的规划热潮逐渐走向缄默销声的全过程。这一轨迹折射出社会转型背景下地方文化自我重塑的重重艰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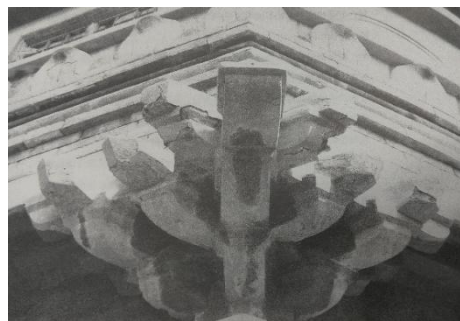


《首都计划》中展示的建筑渲染图^[1]

1 “大屋顶”与多重立场折射下的《首都计划》

外籍顾问茂飞(Henry Killam Murphy)和孙科在民国初期广州主导西式城市改造时便已合作^[3]。二人在广州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后续南京《首都计划》呈现出“完备”与“理性”的鲜明特质奠定了基础。对孙科而言,这些“创举”彰显了其西方留学背景和城市规划理论的专业身份^[4],更成为他获取相关领域话语权的重要契机。茂飞对《首都计划》的影响主要透过孙科来实现。茂飞已摸索出一套“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理论,核心是将继承自巴黎美院传统、以建筑图绘为核心语言的“布扎”(Beaux-Art)体系,与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视觉效果相融合。凭借这套独特技术方法,茂飞在东方“建筑圈”站稳了脚跟,其设计的金女大、燕京大学及“博雅水塔”等作品广受赞誉。《首都计划》完成后,他还承担了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和灵谷塔等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建筑项目^[5]。从更深远意义看,茂飞的经验与方法为西方标准化工业建筑生产体系在中国的落地,提供了一条兼具“视觉愉悦感”与“在地适应性”的路径。国内以“陈明记”为代表的营造厂,受西方传教会影响,为这类建造方法的本土化移植提供了关键支持,有效规避了技术落地的高昂成本,使建造项目在外观上与周边房屋保持协调。

“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这一概念,源自《首都计划》对“大屋顶”式建筑的明确命名。西方绘图透视术与装帧技术催生的“画报”效果,让大众得以“真切”感知传统中国建筑的“固有形式”;而这种感知本质上为“大屋顶”与中国“文化精华之荟萃”赋予了深刻的关联意义。在在城市规划层面,《首都计划》参考美国华盛顿“国会山”的规划,为“中央政治区”选址于紫金山南麓。为确保该区域能被纳入紫金山山腰中山陵的视线范围,以孙科为核心的“国都建设委员会”与“首都建设委员会”围绕选址展开了博弈^[6]。相较之下,建筑外观样式在争论中并未成为焦点。但这种关注重心的倾斜,实则暗含了一种共识:脱胎于北方官式建筑的“大屋顶”形象,足以契合当时掌权者对视觉享受的需求及通过建筑彰显等级差异的诉求。回溯定都选址的论战便不难发现^[7],“固有式建筑”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能巧妙营造出一种仍身处“皇宫”的心理错觉,从而为新都未能充分承袭北京建筑遗产的缺憾提供隐性弥补^[8]。



一组模仿传统做法的混凝土斗拱细部,燕京大学水塔,茂飞设计,1920年代中期^[3]

然而,不论出于何种立场,《首都计划》的核心价值之一,始终是对当时社会背景下“强国复兴”这一普遍诉求的集中表达。五四运动爆发前,巴黎和会上山东管制权被移交日本的外交屈辱极大激发了包括留学生在内的爱国人士的民族主义情感。而《首都计划》的核心推动者孙科,具备留学背景同时受其父孙中山革命理想影响,力图完成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实业兴国”的遗志^[9]。在《首都计划》中,华盛顿、巴黎和柏林等西方现代城市被作为样板,通过前期调研的人口数据,遵循功能主义原则,从道路建设、港口布局、经济发展、城市基建等维度系统勾勒南京未来的发展蓝图。值得注意的是,《首都计划》的制定时间比同样以功能主义原则著称的《雅典宪章》还要早数年^[10]。从根源上看,《首都计划》虽沿用了《实业计划》具体方案,但透露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内核,这表明其诞生并非单纯出于利益博弈的产物。

2 再造“传统”的“中国固有式建筑”

“一国必有一国之文化,中国为世界最古国家之一,数千年来,皆以文化国家见称于世界。文化之为物,大都隐具于思想艺术之中。原无迹象可见,惟为思想艺术所寄之具体物,亦未始无从表出之。而最足以表示之者,又无如建筑物之显著。”这段论述出自《首都计划》中“建筑形式之选择”一章。通过定义文化何为,界定文化与“思想艺术”的关系,最终得出“建筑”最具文化代表性的结论。后以“颜色最为悦目”、“光线最为充足”以及“便于分期建造”三点论证建造形式选择的有效性,体现《首都计划》应用的“科学”原则。

从双重维度来看,一方面,“固有式建筑”确实沿袭了中华大地上具体建造物的视觉形象(如庑殿歇山顶、飞檐、斗拱等特征);另一方面,这种具有“固有”形象的建筑又被置于功能主义原则下审视和归纳,进而凸显相较于西方古典建筑的特性优势。在此过程中,这种“神话”^[11](Mythology)的建构,为“大屋顶”赋予了超越传统范畴的现代意义——它既以具象形态承接历史传统,又试图与现代及未来语境展开对话。“大屋顶”为人

们提供历史归属感,推动人们为了宏大目标共同行动^[12]。然而,若脱离当时具体的社会语境进行解读,便容易忽略一个关键事实: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其制造技术与阐释权实则掌握在垄断资本手中。

“传统”再发明的立场不言而喻,它支撑了“大屋顶”象征符号的意义内核,服务于构建特定社会关系。换言之,“大屋顶”不仅是传统的延续,更是一种出于文化理念传播的需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现代社会文化产业的兴起,其本质是传统价值体系的式微与瓦解^[13]。社会亟需一套新的普适性价值观来替代原有价值体系,而这一过程与工业现代体系的崛起相伴相生。“固有式建筑”恰是这一文化产业逻辑的生动例证,它以“大屋顶”的传统形象构建外在认知,却在本质上遵循现代工业的生产逻辑——即建筑多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与相应的力学技术,成为传统符号与现代生产体系融合的具象载体。当时生产钢筋混凝土所需的水泥和钢铁,大部分依赖外国产品和外资^{[14] [15]}。

理解这一点,便可回应另一个问题——对“固有式建筑”的推崇如何得到人们内心的普遍接受?工业生产体系的兴起为象征符号的复制传播提供了媒介和渠道。然而,象征符号的批量生产仅是文化产业逻辑的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实现其社会渗透。

霍布斯鲍姆指出,“被发明的传统”需要通过反复的公共仪式和空间实践来获得社会认同^[16]。对于“大屋顶”而言,其文化意义的确立不仅依赖于建筑物本身,更需要一套能够让普通民众日常接触、感知和内化这一符号的空间机制。正是在这一需求驱动下,《首都计划》效仿巴黎开辟出城市大道,一种更容易被纳入市政管辖范围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开始出现。在这些空间中,“大屋顶”形象的批量生产、不断累积,直至堆积起社会“景观”(Spectacle),为“大屋顶”承载的文化意义提供持续的“在场性”,同时为社会控制的“现代微观权力”提供深入市民日常的媒介和物质基础。当“大屋顶”的文化价值能够被经济价值衡量时,象征符号便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相应的文化意义便能够在资本社会中实现自我再生产。

然而这样的重构最终没有实现。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那些试图结合传统中国建筑形象与西方建筑设计方法的实践场域大多集中在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建筑师群体中,相应“空间实践”的地理范围也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域,难以触及城市边缘地带,更遑论广大农村地区——这种实践主体与空间范围的双重局限,最终导致“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文化影响力未能突破圈层,无法真正深入社会肌理。

3 西方文化“镜像”中自我重塑的本土文化

“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的核心思想由葛兰西(Gramsci)提出,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解读中进一步关联了“东方学”^[17]的批判逻辑——即西方强势文化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东方文化进行选择性地重构的过程。然而聚焦宏观层面“压迫与抗争”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关注那些在这样背景下未以“反抗”姿态出现的群体的主体性,而非将其物化为等待外部引导的“提线木偶”。他们以日常实践参与文化互动,恰恰构成了文化转型过程中民众集体力量的重要载体。例如,具有“facade”(立面优先)传统的西方古典建筑设计方法,即根据整体建筑轮廓视角的视觉效果来倒推建筑细部的工作方法,在移植到中国本土时,作为并不熟悉地方建筑细部的茂飞来说,陈明记等本地营造厂的工匠智慧为再现茂飞对紫禁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建筑的记忆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18]。

但对于当时拥有更广阔视野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他们表现出的时而抗争时而缄默,并非应当被解读为逆来顺受的精神衰废,而是反映了一种在文化“镜像”中自我迷失的现实困境。

“中国既为文化古国,而其建筑之艺术且复著称于世界,当十七世纪时,中国之建筑艺术,已由欧人之来华考察者传播而施用于欧洲。白兰特(Edgar·Brandt)亦于来华研究之后,以中国之装饰方法,施之外国建筑物之上。”此段来自《首都计划》中的“建筑形式之选择”章节。这里实际上体现了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话语特征——即通过西方的知识框架和价值标准来重新阐释东方文化,将中国建筑艺术的价值建立在“欧人传播”和西方认可的基础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典型的“东方学”论述出现在了作为官方城市规划文本的《首都计划》中。

《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了引进外资发展中国的路径。在其父去世后,孙科亦认为需要外资发展中国的实业^[9]。但这样理想背后也透露着焦虑与需求。反观《首都计划》序言中“观人国者,观其首都”即可恒定国民文化高下的话语建构,便可分析出话语间隐含着“西方”这一“大他者”(Autre/Other)——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大他者”指代那个决定主体认同和欲望结构的象征性权威^[19]。在此语境下,“西方”作为“大他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自我定位时无法摆脱的参照框架。

《首都计划》所提及的“科学”,并非指向科学本身的本质内核,而是在特定话语建构中被赋予了近似“神话”的特质——它被塑造为能够引领民众重塑文

化自信、挣脱现实困境的“弥赛亚”式符号，其深层所折射的，正是当时社会对秩序重建的普遍焦虑。在这一过程中，“大屋顶”经历了一个微妙的话语转换：原本作为西方视角下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客体，在《首都计划》的论述中被重新包装为“著称于世界”的“文化古国”之象征。这种转换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的现实“需求”，言说为彰显文化优越性的理想化“要求”，并且还为了“大屋顶”的建筑形式归纳出诸多符合“西方科学理性”原则的特征与优势。它揭示了一个悖论：所谓“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实际上体现的是“大他者”——即西方文化标准的审美幻象。

与之对照的是，传统中国建筑的形式美学遗产，在“营造学社”以及众多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建筑师的先锋实践中得到了深入探索。他们的工作不止于对“大屋顶”这一经典符号的重构，更着力于拆解其背后的传统营造原理，并尝试与西方建筑美学原则进行深度融合。如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徐敬直与梁思成合作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主殿，以及关颂声、杨廷宝主持设计的国立中央体育场等作品——这些在《首都计划》前后奠基的建筑，共同构建了一个可进行哲学思辨与文化对话的实验场域，为后续本土化路径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先锋美学实践样本。

4 结语

《首都计划》中“大屋顶”的文化表征揭示了民国时期文化转型的深层矛盾。这一“传统”再造过程既非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回归，也非全盘西化的现代性追求，而是在西方文化“镜像”中进行的复杂自我重塑。“固有式建筑”作为文化符号的建构，体现了当时知识精英试图在保持文化主体性与拥抱现代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最终受限于其自身的悖论性质：它既依赖于西方的技术手段和审美标准，又试图通过这些手段来确立文化自主性。“大屋顶”成为了这一文化焦虑的物质载体，承载着民族复兴的理想，却也暴露出文化主体性建构中的内在困境。

从城市史的角度来看，《首都计划》的流产不仅是政治经济因素使然，更反映了这种文化转型模式的局限性——当文化符号的生产逻辑过度依赖于外在的技术和资本支撑时，其文化自主的诉求便难以真正实现。这一历史经验对理解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复杂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 首都计划[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 [2]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王才勇,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81.
- [3] 郭伟杰(美). 筑业中国：亨利·茂飞在华二十年(1914-1935)[M]. 卢伟, 冷天, 译.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22.
- [4] 沈成飞. 论孙科的第二个广州市长任期——以广州官产案为中心的考察[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81-91.
- [5] 苏艳萍, 鄢增华. 南京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J]. 档案与建设, 2013(10)：50-52, 38.
- [6] 宋雨. 1929年南京《首都计划》历史文化思想解读：政治、学术与社会力量的博弈[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 29(4)：33-38, 48.
- [7] 高红兵. 民国“国都论争”与北京城政治形象的衍化[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4, 39(1)：14-22, 35.
- [8] 董佳, 刘素林. 民国政治与城市规划的地方互动：南京“中央政治区”选址的变更进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4, 29(4)：149-158.
- [9] 刘青莉. 1930年代《实业计划》的研究及实践热潮[J]. 西部学刊, 2023(14)：132-135.
- [10] 国际现代建筑学会, 清华大学营建学系. 雅典宪章[J]. 城市发展研究, 2007, 14(5)：123-126.
- [11] 罗兰·巴特. 神话修辞术[M]. 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12] 汤普森·约翰 B.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铨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 [13] 霍克海默·马克思, 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4] 尤宇. 晚清民国水泥工业及技术的发展(1889--1949)[D]. 安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0.
- [15] 魏晓锴. 民国“黄金十年”是想象的幻景[J]. 历史评论, 2022, (04)：25-29.
- [16] 霍布斯鲍姆·埃里克, 兰杰·特伦斯. 传统的发明[M]. 顾杭, 庞冠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17] 萨义德·爱德华.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18] 冷天. 墨菲与“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例[J]. 建筑师, 2010(2)：83-88.
- [19] 雅克·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作者简介：张富杨（1999.07.14—），男，汉族，江苏淮安人。目前是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生。主要从事包括建筑理论，现当代美学理论，跨学科研究等领域的研究。